

◀ (上接2版)

要,而作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也是他需要去做的,当时国难当头,再去做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和欣赏的绝学,也就是非常技术、专业的学问,是否也不太合适?这一点还要继续讨论。

季先生最专业的是巴利文、梵文、吐火罗文等等。比如他的《弥勒会见记》译释,那是他的专业,我们不懂,他主持编的《大唐西域记校释》是中外交通史文献研究的典范之作,也很精深。但是他的《蔗糖史》则是我非常赞赏的书。《蔗糖史》是将历史学、文献学和语言学的方法交叉起来,由蔗糖来讲全球交流史。季羨林先生指出,糖在英语里是sugar,法语、德语等好多语言里的“糖”字,都来自梵文的sarkara,而在敦煌残卷上发现汉语的“熬割令”,其实就是这个来自梵文的“糖”。从这里开始追踪,通过糖讲中外交流,很有意思,我注意到它和最近这几十年世界各国学者对于“糖”的研究,刚好呼应起来。你知道,全球史也好、亚洲史也好,丝绸、瓷器、茶叶、蔗糖,当然还有鸦片,都是可以突破一国史,把世界或亚洲历史连起来讨论的一个好的切入点。所以现在还要好好重新评价这部书。当然,《蔗糖史》是季先生晚年所写的,《弥勒会见记》也是他晚年的著作,季先生在解放以后走了很长一段路,最后还是回到这里。

此外,观念上还有没有一点儿接近的地方呢?陈寅恪先生很明显地表现出对现代以及西方文化比较保守和怀疑的意思,觉得要捍卫中国文化。所以他讲自己是“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但是,晚年的季羨林不也是一再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吗?在这里老一代学者好像有点儿相似。这些老一代的学人身处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很担心中国文化断裂,所以,多少都捍卫中国文化,但你应该注意,他们又是在外面留过学的,不是那么完全保守,他们也赞成现代的民主和科学,所以,他们常常表现出来的是,一方面他们很留恋中国文化的传统,期待中国文化“三十年河西”,能够发扬光大,但是他们也反复讲,不能拒绝世界的很多文化,也不能把新时代取得的一些现代学术成就统统扔掉。举一个例子,1930年代在面临民族危机和国家危亡的时候,很多人又回到信古,讲三皇五

帝历史,陈寅恪先生就不同意,他觉得,如果因为政治形势而把好不容易取得的一些学术成绩丢掉,这是不行的,这里也包括对“古史辨”这种历史思潮的同情理解。季羨林也这样,包括讲所谓“国学”,他也意识到“国学”太狭窄了,也觉得要超越汉族中国之学,所以他特别讲“大国学”,我虽然不同意这种把概念撑大了来将就内容的做法,但是也能够理解他们,他跟费孝通的想法很像,费孝通原来搞“民族识别”,后来讲“多元一体”,也是这个心情和道理。

这也适用于周一良先生。其实,如果你仔细了解季先生和周先生,你会看到,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被时代洪流卷进去,但是,归根结底到骨子里面,他们对中国传统、对学者立场还是有很大依恋的,只要环境给他们自由空间,他们还会表现出学者的良心。他们不会像后来“文革”年代把这些传统的都视为四旧,也不像现在很多人对传统隔膜。他们都睁眼看过世界,对世界都有切身的了解,不像一些极端保守的人,他们骨子里对世界上的好价值都是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晚清民国延续下来的一代学人,和后来包括我们这一代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这一代,也包括更年轻的一代,有很多方面跟真正的传统,不光是古代传统,也包括五四传统,其实割裂得很厉害,这不是搞搞百家讲坛、诗词比赛、读读《弟子规》之类就能改变的。

沈曾植能真正被理解吗?

文汇报:那么像沈曾植这样,原本要“继承前哲”、“开创来学”,在学术上“绝不保守,真是新潮”,能与西洋东洋学者在学术前沿话题上分庭抗礼,并且也在乎“在环球学界伟人中高踞一席”的人,在学术史上却渐渐被人遗忘,您觉得与他政治立场保守、满肚子不合时宜有关。今天,学术史对沈曾植的记忆恢复了吗?

葛兆光:我不觉得今天的人们已经了解他了。真的能够不仅记住沈曾植的学术史意义,而且在学术上也把他当作一个典范,恐怕还要一点儿时间。实际上,沈曾植当年的开拓性研究,比如考证突厥碑、做佛教道教、对西北史地的兴

趣,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预流的学问。我总觉得,中国学术跟现代国际学界的第一波接轨,就是他们那个时代,当然可能还早一点儿,所以王国维才说“道咸之学新”。“新”是什么呢?王国维在给沈曾植写寿序的时候曾经说,那个时代,讲经学就讲今文经学,讲史学就讲辽金元的异族之史,讲地理就讲西北,这是当时的“新”。可是,这些东西后来成了“绝学”,什么是“绝学”,就是少数学术精英把玩的、极其专门的学问,也许只有三两个同行互相切磋呼应,可是它无法影响学术与时代。可是,沈曾植研究的那些东西,其实和大时代、大学问、大关怀是有关系的呀,你不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亚洲和世界的关心点,不了解当时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变化,不了解那个时代中国面临的时代巨变,你不能体会这些看上去冷僻的学问其实有大意义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讨论学术史,其实很重要。

很多人并不了解,那个时代这种学问是很重要的,不仅在中国很重要,那时候的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也在往这个方向走。当时的国际学界有这样一个潮流,这也就是我现在一再跟大家讲的,其实“四裔之学”在当时很重要。沈曾植走在前头,是当时很重要的学界领袖。陈寅恪、王国维都特别佩服他,日本学者和俄国学者也很佩服他。但是,沈曾植在当时那么有影响,算是学界大佬、领袖人物,即便民国后他隐居在上海,各色人等还是络绎不绝地去朝拜他,包括当时日本东洋学的大佬,可为什么后来人们总觉得他的这些学问是“绝学”?我前面讲,这是因为在中国,它跟整个的政治、国家、民族的大关怀没有联系起来。

文汇报:为什么欧洲、日本学界这时候也对这些领域感兴趣?而后来的民国学术主流却不在这里?

葛兆光:这是一个很复杂、也是需要讲很久的学术史问题,这里只能简单说说。欧洲东方学对这些有兴趣,是因为欧洲学者认为,作为欧洲的“他者”,这个亚洲太特别了。18世纪以来,帝国之间彼此碰撞,欧洲逐渐发展,向世界也向亚洲扩张,觉得那个“异域”那么复杂,所以,他们不仅想要去了解中国,也想要了解中国周边,后来影响很大的所谓“西域南海之学”,不仅包括现在的中亚,也包括现在的东南亚、南亚,当时的探险

和考古、历史和语言、对勘与翻译,成了东方学很大的领域。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东洋学家们也觉得,日本应该是亚洲的盟主,既然要领袖亚洲,那么对于亚洲就要有完整的研究。特别是,他们觉得日本和朝鲜、朝鲜和满洲、满洲和蒙古、蒙古和西域,似乎是一个连接的文化地带,而中国呢?应该只是长城以南的汉族这块,满、蒙、鲜应该都和我们日本相连带,于是,特别是明治大正时期,在日本这个学问就迅速成为主流的、和日本息息相关的,都触动到社会关怀的东西。

可是中国不太一样,民国建立以后学术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走的,启蒙和救亡对于中国很重要,特别是二战爆发以后,学界主流是保卫“中国”和建构“中华民族”,所以在西域南海,或者说满蒙回藏等史地领域,虽然也有涉猎,但进展没有那么大。“道咸之学”为什么会“新”?民国学术为什么会那样转型?在转型中这类学问为什么逐渐边缘?其实,是要好好想想。真正了解了这一点,沈曾植,包括当时的王国维、陈寅恪做的一些东西,才能够被理解,所以我说,他们真正被理解恐怕还要一些时间。

当然,现在学术界有一个“理解边缘”的声音。我记得王汎森兄就曾经来复旦讲过“执拗的低音”。现在确实有不少学者,比较重视晚清民国学界边缘的一些人,像缪凤林、蒙文通、刘咸忻这些边缘史家的声音,我当然赞成“发潜德之幽光”,也觉得这些主旋律之外嗡嗡的声音,形成不同声部,丰富了现代学术史。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晚清民国学术的主流,也就是改变传统学术使之成为现代学术,主要的影响大的人,当然应该是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等。你看顾颉刚1947年写的《当代中国史学》,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主流是什么。所以,发掘边缘是有道理的,但不能把边缘变成主流。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他们,仍然是改变传统,融入国际的学术潮流,他们对史学影响太大,绝不是边缘的人物能够取代的。当然,我也觉得有一些边缘人物,像沈曾植那样——在当时看来是很保守的人——却没有被理解,倒是应该把他们发掘出来重新理解,这可能是补充主流学术的重要方面。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这种转轨里中国学术的主流是什么。

文汇报:有人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崇拜和扬弃学术偶像的个人经历。您在各阶段也有偶像吗,随着研究论题的转换?

葛兆光:你说一个学者在学术生涯的每个阶段都有偶像吗?我可能有憧憬的“楷模”,但从来没有崇拜的“偶像”。我们这一代人在1980年代开始进入学界,好像前面是一片空地。我们的不幸在这里,我们的幸运也在这里,因为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学术荒废的时代,所以,好像我们是“天生石猴”,可能有人指点,但是很难循规蹈矩,把某某当作礼拜对象。当然,我们的问题也在这儿,并不规范也并不坚实。我们有很多师友,像我的书里讲到的,但是,那个时代思想在大变动,学术也在大转型,他们并不一定决定我们的学术方向、学术特点,没有现成的那么一批引路人。所以,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有一个重返学术史的热潮,其实,也是在寻找自己学术要走的方向。我们老师这一代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但不成为你们所说的“偶像”。1990年代那个时候民国学者很红火,大家都在讨论,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其实主要还是借助学术谈论社会关怀,不太会像亦步亦趋的偶像。

但我得承认,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胡适。我一直觉得,在学术上很多人把胡适看低了,觉得他的思想现在还有意义,他的学术似乎早就过时了。其实不见得。好多人觉得胡适写文章清浅明白不深奥,好像学术也就是这样了。可是,如果你回头看看学术史,你会看到,胡适在好多方面都是开创和建立典范的人。第一个是中国哲学史,余先生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个典范,用西方的框架梳理中国的思想,他把中国材料和西洋模式进行结合,改造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叙述的一个方式,也许后来有人超过他,但他建立了这样一个典范。小说考证也是吧,《醒世姻缘》啦,《红楼梦》啦,《封神演义》啦,他不是开辟了一种小说史的研究范式吗?我自己做的禅宗史也是,胡适在中国禅宗史上,开辟了文献学和历史学结合的方式,率先通过敦煌文书考证禅宗史上的攀龙附凤,很了不起,即使他的具体结论有问题,但是你还不是在他的路上吗?所以,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讨论禅宗史研究的方法,强调胡适的意义。或许,胡适

(下转4版) ▶